

#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共同体意识研究

乔瑞金, 尤 澜

**[摘要]**建设文化共同体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群体用以抵抗异化、形成凝聚力、组成自由人联合体的基本路径之一。分别以责任、共享与承认为内核的核心意识、目标意识和主导意识,是构成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思想理路。责任作为工人阶级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意识,不仅是衡量共同体文化的内在尺度,更凝聚成为一种有机的文化形态,其本质正是在共同体成员履行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形成的“可感知的共同体”意识。共享作为工人阶级文化共同体的目标意识,超越了简单的物质分配,旨在实现价值共创的共同体伦理文化。这种目标意识通过“被发明的传统”得到巩固,并根植于共同的人性、物质基础及政治行动中,进一步推动共同体走向聚合与繁荣。承认作为工人阶级文化共同体的主导意识,将文化“情感结构”视为底层意识,主张构建反思性的情感纽带与共同记忆,为文化主体夺回身份认同与尊严,最终达至本真性的文化共同体生活。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为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了理论及实践路径。

**[关键词]**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工人阶级;文化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26)01-0022-11

DOI:10.13624/j.cnki.jgupss.20260319.001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是20世纪中叶以来针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所做出的最为深刻的揭示,亦是尝试重建工人阶级文化的卓越典范。一方面,他们深刻揭露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本性,认为它导致了普遍的文化异化、文化商品化和文化垄断,使得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普遍的信任,造成了人的自私自利和对他人的漠视,破坏了人们本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享有的自由民主的文化生活,把工人阶级的文化共同体打得粉碎,使得互助的、友善的、共享的和有责任感的文化意识荡然无存。另一方面,他们面对现实的社会文化发展状况,尝试立足于唯物史观的价值立场和科学研究方法,开拓工人阶级文化共同体的建设道路,围绕责任、共享与承认等主题,开展理论探索和文化实践,通过争夺文化领导权、开展文化领域的微观革命斗争和提升工人阶级的文化共同体意识等方式,同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意识相抗衡,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共同体意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本文中,我们将围绕责任、共享以及承认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意识、目标意识和主导意识做出分析,以此求教学界同仁。

## 一、责任是工人阶级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意识

就文化共同体的责任意识而言,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归因于不负责任的制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国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批判思想史研究”(23&ZD017)

**作者简介:**乔瑞金,山西石楼人,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哲学博士;尤澜,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主张在个人领域通过“道德地形学”“有机文化”“可感知的共同体”等路径实现思维变革,形成工人阶级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意识,以此克服共同体意识的消弭。

首先,责任是共同体文化建设的内在价值尺度。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杰出代表泰勒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是“无人情味的机制……政治自由的丧失意味着即使留下的选择也不再是我们作为公民所做出的,而是由不负责任的监护权力做出的”。<sup>①</sup>在“不负责任的监护权力”下责任的客体被窄化了。在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中,个体对共同体、邻居以及周围环境的责任被边缘化,仅留下了那些能够纳入成本计算的范畴。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本质上奖励“有限责任”,而非公民之间基于文化共同体的“无限关怀”。基于此,泰勒主张建立一种本真性的伦理文化,即“道德地形学”。在这种伦理文化或“道德地形学”中,道德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我们对其他人的责任。<sup>②</sup>在泰勒看来,本真性的伦理文化将重塑我们的共同体生活。一方面个体能够在共同体中通过实践达到自我实现,另一方面共同体通过共同分担责任可以形成真实而非虚假的共同体文化。诚如泰勒所说,“本真性打开了一个责任化(responsibilization)的时代……依据这个文化发展之事实,人们被迫去承担具有更多的自我责任”。<sup>③</sup>真正的责任应当来源于个体对共同体生活的关怀和担当。如同西塞罗所说的那样,“我们生下来并非只是为了自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朋友都有权要求我们尽一份责任”。<sup>④</sup>因而,责任成为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内在价值尺度。这种以责任为主的文化“把我们带回与自然的紧密联系之中,弥合理性性与感性之间的内在分裂,克服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并形成共同体”。<sup>⑤</sup>

泰勒强调责任是共同体重要美德要素,并指出节制的美德是“一种责任和利他主义的伦理”。<sup>⑥</sup>在宇宙观层面,“道德地形学”对共同体中责任要素的有力辩护是“必须履行的责任与受损的和分裂的天命是相联系的”,<sup>⑦</sup>即这种共同体秩序是以宇宙本身的等级秩序为源头展开的。无论是君主的统治、农民的耕种还是祭祀的仪式,其价值都源于他们在这个更大的宇宙秩序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要有任何可持久的社会,某些选择就必须加以限制,某些权威就必须得到尊重,某些个人责任就必须得到承担。”<sup>⑧</sup>在社会观层面,泰勒指出“一种建立在团结和相互信任的价值观基础上的类似公共文化的东西在不同的工人阶级共同体中出现了”。<sup>⑨</sup>在他看来,家庭、邻里、社区等共同体形式是个体社会化和道德发展的重要环境。这些形式为个体发展提供了相近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也成为个体道德认同和行为模式的基础。当这些共同体形式因资本主义文化异化而解体时,个体则失去了道德参照点和社会支持,导致个体对道德空间认识的模糊。在历史观层面,他强调“说一种生活有意义,就是说它的责任与权利、自由与奴役以及它的基本取向形成了一个模式;在这种准艺术的意义上,上述因素对按此模式生活的人就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整体”。<sup>⑩</sup>这种基于责任文化的共同体就是泰勒推崇的具有美德要素的集合体。他进一步指出,“就道德责任本身而言,与社会义务相关的责任最重要”。<sup>⑪</sup>这种社会义务反映的是共同体对个体责任的呼唤。由此而言,泰勒对共同体内部责任的主张在宇宙观、社会观和

①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程炼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13页。

②尹金萍:《查尔斯·泰勒认同伦理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54页。

③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程炼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93页。

④西塞罗:《论老年 论友谊 论责任》,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99页。

⑤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第553页。

⑥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张容南、盛韵、刘擎等英译,崇明法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第451页。

⑦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林曼红译,译林出版社,2014,第52页。

⑧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张容南、盛韵、刘擎等英译,崇明法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第543页。

⑨张亮、熊婴编《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第257页。

⑩张亮、熊婴编《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第251页。

⑪李亚莉:《西塞罗基于自然和理性的道德责任观》,《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24年第4期。

历史观等维度上均指出了责任这一美德要素对构建有意义的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其次,共同体文化是一种以责任为基础的有机文化。

文化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霍加特把文化看成一种“有机的文化”,而责任是“有机文化”在共同体中的重要体现。1960年,在英国全国教师联合会(National Education Union)举办的一次主题为“流行文化与个人责任”的重要会议上,霍加特也躬逢其盛,积极参与讨论。<sup>①</sup>在会上,霍加特阐述了家庭以及社会网络如何成为人们生活中心的问题,指出阿姨、叔叔、祖父母等家庭成员在个体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邻里之间的交往充满了具体的责任和关怀,如借一块糖、帮忙照看孩子等。这表明文化网络是具体的、有机的、面对面的真实形态,即个体的身份和价值是在与他人的责任关系中得到确认的。这种二战前以英国工人阶级社区为主体的“有机共同体”以紧密的邻里关系、血缘网络、共享的生活态度和口语文化为基础。对于国家而言,每个政府都有承担其前任罪行的责任,而每个国家也都对其历史行为负有责任。在霍加特看来,以“有机文化”为核心的共同体形式产生了一套非标准的、具体的道德准则,如互助、团结、脚踏实地、幽默感等。这种道德准则为成员之间的互相帮助与支持提供了助力,并能够进一步推动成员以工会、合作社等形式践行集体责任,形成了从个体到共同体的文化意识,为实现基于责任的共同体文化奠定了基础。

最后,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共同体内责任与义务的“可感知的共同体”意识。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人物汤普森认为责任是共同体具有合法性、规范性的基础,在家庭关系中,“父亲意识到对他儿子的职责和责任,儿子则默认或殷勤地表示其孝顺”。<sup>②</sup>这种自上而下的关怀与庇护和自下而上的孝顺与顺从,实质是一种基于共同体责任的相互义务。以家庭为中心的责任网络是一种合理的循环,提供了稳定的人际关系,形成了人们普遍认同的意义感和安全感。其中,“情感”与“责任”是相互交织的。在汤普森看来,“织袜工举行一次大示威,‘吵吵嚷嚷地要求工作和比较公平的售价’”,<sup>③</sup>实际上是基于责任的“情感结构”在经济领域的体现。这套伦理观念和情感反应被称作“道德经济学”。当粮食涨价时,民众的骚乱并非毫无理性的暴动,而是“道德经济学”指导下的集体行动。他们常常有纪律地迫使商人以“公平价格”出售粮食,并将所得款项归还商人。汤普森批判资本主义共同体秩序将人的劳动视为孤立的,指出其将市场逻辑置于共同体福祉之上,从而瓦解了“可感知的共同体”这一经济文化基础。在“可感知的共同体”中,人们认同同一价值观并愿意为集体的生存而行动。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冲击,原先的共同体瓦解了。汤普森认为人们对原有“责任”观念的呼唤,并非呼唤回到“家长制”的旧有压迫关系中,而是对资本主义非人道主义剥削关系的反抗。基于这种对责任观念的新理解,他指出“国家应参与传播一种‘新道德’:国家将构建一个社会发展的‘铸模’,纠正广泛存在的失误,‘以将之前一直活跃于小型共同体里的价值调整、价值同化、价值调和、价值标准化等方法在更大的范围上树立起来’”。<sup>④</sup>无论是前资本主义时代还是资本主义时代,“可感知的共同体”均是一种具有合法性的道德经济规范秩序的基础。由此,人们能够自觉形成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责任网络,具备了形成共同体意识的条件,以共同的文化认同推动社会合作并形成社会聚合力。

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看来,责任不仅是家庭关系的纽带,更是形成文化共同体的关键要素和核心意识。“亲属关系的价值——有时也是它的责任,在于这种关系是独立于个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并且在

①赵国新:《文化研究》,《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

②爱德华·汤普森:《共有的习惯》,沈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22页。

③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下,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13,第646页。

④蒂姆·罗根:《道德经济学家:R.H.托尼、卡尔·波兰尼与E.P.汤普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成广元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第203页。

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理所当然的态度去对待之”,<sup>①</sup>而“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是保证个体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最有力的保证是最少干涉个体的自由”。<sup>②</sup>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基于血缘关系、先于个人选择的邻里与社区联系,以及诸多来自“可感知的共同体”的自然纽带,为个体原子化冲击下的共同体团结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现实基础。

## 二、共享是工人阶级文化共同体的目标意识

就文化共同体的共享意识而言,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指出资本主义内在包含了文化异化、文化商品化、文化霸权等问题,提倡在公共领域以“编码/解码”“被发明的传统”“审美意识形态”等为切入点、形成共同文化为目标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意识。其中,霍尔从符号学、诠释学角度对公共领域的共享形式做出辩护,指出主体能够通过符号等语言表现形式获得共同的情感支持,形成新的文化生存方式,从而抵御资本主义文化的侵蚀。霍布斯鲍姆则认为民族国家是“被发明的传统”,人们一方面通过共同生产实现利益共享,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共同的节庆/仪式夺回被资本主义文化异化的权力。伊格尔顿推崇共同文化,指出共享是人们普遍的伦理理想。泰勒通过整合霍尔的诠释学视角、伊格尔顿的共同伦理理想,以及霍布斯鲍姆对民族国家的洞见,形成了一套以公有制、共有价值和共享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化共同体理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共享文化的主张,推动了工人成为自觉自为的文化主体,为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首先,互存、共享是文化共同体的目标意识。

霍尔主张以“编码/解码”“接合”以及符号学等理论和工具在公共领域建立共享环境,指出文化批判具有互存思维。他强调:“用共识语言讲,身份认同建立在共同的起源或共享的特点的认知基础之上,这些起源和特点是与另一个人或团体,或和一个理念,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自然的圈子共同具有或共享的。”<sup>③</sup>他的理论阐释了文化共同体被建构的过程。其一,他论证了“编码/解码”理论,意在将大众通过文化介质联结起来。他认为统治阶级通过大众媒体将意识形态编码进文化产品,批判“我们社会中的广播业生产精英与其受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实际上是一种‘被系统地扭曲的交流’”。<sup>④</sup>一方面,意义必须通过被“编码”成特定的符号(电视节目、新闻、广告)这一物化过程,才能进入流通领域。另一方面,受众则通过“解码”这些符号来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他指出,统治不仅是靠武力,更要靠赢得被统治者在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认同。其二,他用“接合”理论抵抗异化问题。他批判文化产业的劳动就是将活生生的经验“异化”为可售卖的文化符号。我们通过消费这些异化劳动所生产的符号,来理解并想象我们的共同体。其中“‘市场作为提供者’的日常体验,这与更具社会责任感、福利导向、共同利益的追求背道而驰”,<sup>⑤</sup>加剧了共同体的分裂趋势。“接合”理论指出这种共同体意识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需要将各种分散的文化元素、社会诉求和政治观点“接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团结的、有行动力的整体,从而抵抗异化。因而,“对抗式解码”本身就是一种直接的、日常的文化反抗。当工人将一则宣扬“企业大家庭”的广告解读为掩盖剥削的谎言时,当少数族裔将一条关于“移民问题”的新闻解读为种族主义叙事时,他们就是在打破物化逻辑的链条。他们拒绝接受被赋予的、物化的定义,并重新夺回了意义的阐释权。这种实践让文化消费不再是异化劳动的延伸,而是成为意义争夺的战场。其三,他用

<sup>①</sup> 罗伯特·N. 贝拉、理查德·马德逊、威廉·M. 沙利文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公共责任》,周德明、翁寒松、翟宏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151页。

<sup>②</sup> 乔瑞金等:《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13,第230页。

<sup>③</sup> 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编著《文化身份问题研究》,庞瑞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3页。

<sup>④</sup> 戴维·莫利编《斯图亚特·霍尔文集》,黄卓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第283页。

<sup>⑤</sup> 斯图亚特·霍尔、侯子然、岳忆宁等:《斯图亚特·霍尔:一位米字旗上的“游牧者”》,《文化与传播》2024年第5期。

“符号”培育共同体意识。他指出,“符号可以形塑一个阶级,构建身份认同,培育共同意识,孕育团结友爱的基础”。<sup>①</sup>符号通过将抽象的情感、记忆和理想转化为具象的旗帜、语言、仪式或故事,为分散的个体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情感坐标和意义框架。结社自治文化“体现在人们与共享空间的特征所结成的关系当中”。<sup>②</sup>这种共享的符号体验,使得彼此孤立的个人能够相互识别,感知到彼此同属一个意义深远的集体,从而自发地团结并产生联结。因而,共同体通过“编码/解码”“接合”以及符号学等理论和工具实现公共领域的文化共享,这些理论和工具的互存思维成为共同体内成员共享的科学解释导向。

其次,共享是“被发明的传统”意识。

霍布斯鲍姆将“共享”概念纳入历史与文化中具体分析,指出我们认为古老的、能凝聚群体的“共享”传统,实际上是相当晚近的“被发明的传统”。这种“共享”传统体现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维中的合法思维规范。他强调,“劳动节和基督教的假日共享了对普世性(universality)的渴望,或者用工人的词来说: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sup>③</sup>很多看似古老的文化实践和仪式,实际上都是近代为了构建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而发明的。当旧的血缘、宗教共同体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瓦解时,社会需要新的纽带延续。民族国家、公共教育等现代形式通过“发明传统”,如设计国旗国歌、确立公共仪式、编写民族历史来人为地创造出共同体认同。这些传统看似古老,实则是为了满足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性需要而进行的“发明”。它们不是自然生长的,而是被精心设计、推广并被大众理解和接受的。这个过程旨在应对传统感性纽带断裂后的认同危机。在此基础上,“大家可以通过参与生产过程——通过拥有工作,或者农夫或工匠通过在市场卖掉自己的产出来获得收入——以一种稳妥的方式来共享获利”。<sup>④</sup>由此展开了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但是带来的却是对工人的进一步异化。于是,工人阶级“慷慨激昂地以意识形态的理由来反对节庆性质的想法”,<sup>⑤</sup>如工会和工人政党的仪式、工人体育俱乐部、合唱团以及教育协会等。因而,“共享”是一种为应对传统社会纽带断裂而被有意识地发明和推广的状态,并逐渐用于构建集体认同的文化与政治工具。这种基于“共享”的文化与政治工具是一种合法思维规范,塑造着一代又一代人民对共同体的丰富想象,形成了积极的聚合力。

再次,“共享”是一种基于共同人性、物质基础和政治行动的共同体伦理的文化意识。

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推崇共同文化,他指出“共享”是一种基于共同人性、物质基础和政治行动的伦理意识,主张以“团结”的形式抵抗异化和冲突。这种共同文化以聚合思维凝聚变革社会秩序的根本动力,在公共领域将个人的力量聚合为团体凝聚力。“资产阶级主体需要他者来证明它的权力和财产不只是幻想,来证明它的活动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活动是在共享的客观世界里进行的。”<sup>⑥</sup>这种对他者的承认和依赖,恰恰暴露了资产阶级主体性固有的虚假与脆弱。资产阶级试图创造一个由它主导的“客观”世界来确证自身,但世界的“共享”性质预埋了单边权力逻辑终将被颠覆的种子。基于此,伊格尔顿赞同“威廉斯试图有所突破,因为他要强调共同制造文化的过程,这涉及更伟大的文化的多样性”。<sup>⑦</sup>在他看来,文化领域绝不是阶级斗争的避风港,而是资产阶级用以驯化工人阶级革命本能、将其整合进资本主义秩序的前沿阵地。工人阶级亟须从这种遮蔽中脱离出来,夺回文学与美学的革命

①盖伊·斯坦丁:《朝不保夕的人》,徐德骝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第6页。

②斯图亚特·霍尔:《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孟登迎、胡疆锋、王蕙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第119页。

③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非凡小人物:反对、造反及爵士乐》,蔡宜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86页。

④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论历史》,黄煜文译,中信出版社,2015,第52页。

⑤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非凡小人物:反对、造反及爵士乐》,蔡宜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83页。

⑥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付德根、麦永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61页。

⑦特里·伊格尔顿、马修·博蒙特:《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王杰、贾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232页。

阵地,重塑自身的革命主体性。他强调,“团结是人类政治变革的必要条件”。<sup>①</sup>这种基于共同利益与价值的团结,正是工人阶级抵抗资本逻辑下的劳动异化、凝聚集体力量的最重要的武器。伊格尔顿写道:“查尔斯·泰勒曾经指出,虽然福柯不相信从权力的制约下解放出来的概念,但他自己关于权力的概念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意志的观念,事实上就产生不了什么意义。”<sup>②</sup>正是这种对“解放”的坚定信念,使伊格尔顿更加肯定“共享”作为凝聚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并要求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从自在转变为自为,在共享的团结中走向解放。有鉴于此,共同文化成为变革社会秩序的合力,为人的自由存在和自我实现做出了积极贡献。

最后,共享是实现价值共创的共同体文化意识。

泰勒主张从共享与公有制、共享平台与价值共创、共享文化与斗争表达入手,形成适配现代社会的共享文化共同体。他指出,“我们应该关注他人,我们应该变得无私,而且我们有能力达至这一理想”。<sup>③</sup>其一,他强调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共享是公有制的重要特征之一。泰勒质疑左翼对右翼改革的简单化反对,并指出国有化等制度变革不应仅仅是手段,而更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新左派反对与传统左派政党及其领导传统有关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政治集权和制度化的等级制。”<sup>④</sup>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不仅需要制度变革,还需要建立一种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的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sup>⑤</sup>建立公有制并非最终目的,其根本价值在于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解放奠定物质基础。其二,他提倡大众文化在市民社会的广泛传播,形成共享平台,实现价值共创。正如德沃金所言:“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在人类学意义上看待文化,将其理解为日常生活和经验的表現。”<sup>⑥</sup>基于此,他将马克思的“现实的人”与文化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活生生的人”结合。他批判部分学者将社会主义简化为一种“手段”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其制度与人际关系的统一。他批判人们日常生活的无意义感,其理论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接续点就在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不仅包含同一性,也包含异质性。他指出差异文化“要求我们对一些并非普遍共享的东西给予承认和地位”。<sup>⑦</sup>泰勒认为,大众文化的关键不在于其同一性,而在于它对那些具有普遍共享性的内容予以确认和包容。泰勒承认文化是共享的,价值共创的核心就在于共享的公共平台。其三,他倡导无产阶级应当在共享的文化斗争与表达中锻造革命集体意识。泰勒不仅为工人阶级发声,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文化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新样态。在一定程度上,他接受了同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霍尔的部分核心观点:“‘大众’就是‘被无产阶级化’的那些人。”<sup>⑧</sup>他指出,个体的身份和集体的认同并非预先给定,而是在共享的对话中形成的。语言学“总是在共同关注或共享的空间内进化”。<sup>⑨</sup>语言作为泰勒主张的共享文化斗争与表达的介质,在不断被用于表达的同时创造出了属于无产阶级的话语体系,从而打破了固有的文化霸权,形成集体的政治身份。“社会主义甚至可以被定义为人们能够发现一个解决方案的声明,即他们可以建立一个没

①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译,新星出版社,2011,第128页。

②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付德根、麦永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385页。

③詹姆斯·史密斯:《如何(不)世俗——解读查尔斯·泰勒》,高喆译,上海三联书店,2024,第88页。

④张亮:《英国新左派运动及其当代审视——迈克尔·肯尼教授访谈录》,《求是学刊》2007年第5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页。

⑥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历史学、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第111页。

⑦C Taylor,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9.

⑧戴维·莫利编《霍尔文集》,黄卓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第15页。

⑨C Taylor, *The language animal: The Full Shape of the Human Linguistic Capac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3.

有异化的工业社会,他们能够再创造不回归封闭性社会的、没有专制的、有意义的社会关系。”<sup>①</sup>泰勒提倡在工人阶级层面形成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大众文化,从而进一步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给工人阶级带来的虚无感,以文化共同体的形式重建共同体中的仪式、文化与意义,夺回工人阶级在文化领域的主导权。由此而言,泰勒主张“承认不同同一性的平等价值——要求我们共享比单单相信这个原则还要多的东西”<sup>②</sup>。这种共享的原则不仅促进了工人阶级凝聚文化和观念上的共识从而形成无产阶级,更弥合了资本主义分裂的文化样态,为进一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承认拓宽了道路。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提倡的共享道路与马克思主张的共产主义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道路是一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特定民族历史文化有效结合的典范。”<sup>③</sup>一方面,英国马克思主义坚持文化唯物主义的道路上,形成了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文化变革集体。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信守诺言、尊重他人财产权等正义规则既符合个人利益,也能够满足公共效用”,<sup>④</sup>进一步在公共领域展开了对文化共同体理论的现实实践,真正达到了以文化为生存方式的目标。共同体意味着成员共系于同一命运、传统和情感纽带。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弊端就在于,它将共享视为等价回报。“共同体的互惠性与市场的互惠性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市场推动的生产性贡献并不是出于对自己同胞的责任和一种为他们服务同时又得到他们服务的欲望,而是出于金钱的回报。”<sup>⑤</sup>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群体推崇的共享不仅指对物品的分享,更是一种基于情感、责任和承认的共同所有。因而,社会主义的共享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要通过促进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分配,在高质量发展和‘做大蛋糕’中使绝大多数人都共享幸福美好生活”。<sup>⑥</sup>

### 三、承认是工人阶级文化共同体的主导意识

就文化共同体的承认意识而言,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批评了资本主义文化存在蔑视与侮辱等病灶,强调在主体间领域采用“情感结构”“承认理论”“反思性承认”等思想以达至变革社会秩序的目标。实现社会秩序变革需要在工人阶级中培育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培育过程就是文化共同体生成的过程。这种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应以民主、平等和团结为核心,而不是以暴力和专政为特征。承认作为裁决他人的固有价值,或人为的规范、思想和规则,具有两个向度。强迫地承认无意义,自由地承认才能导向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对承认的深刻认同,铸就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意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中的“聚合思维是指他们强调要把各种影响社会变化的因子聚合成一个整体,尤其是要把推进社会变革的各种动力,即坚实的物质力量和高尚理性的精神力量聚合在一起”,<sup>⑦</sup>推动形成社会秩序新形态。文化共同体的凝聚力则为工人阶级提供支持和保护,使他们能够在资本主义异化下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从而实现变革社会秩序的共同目标。通过文化共同体的组织和动员,工人阶级能够形成共同的目标和诉求,从而推动社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因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更宏观、更多元的角度审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问题,形成了以文化共同体为路径的社会秩序变革方案。威廉斯的“情感结构”,吉登斯的反思性承认,迪克·赫伯迪格、保罗·威利斯的反叛性承认,均

①张亮、熊婴编《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第250页。

②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炼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84页。

③宗益祥:《化危为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道路重访》,《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④谭安奎:《公共理由、公共理性与政治辩护》,《现代哲学》2011年第6期。

⑤乔瑞金:《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13,第344页。

⑥王道勇:《在社会合作中增强社会活力》,《学习与探索》2025年第7期。

⑦乔瑞金:《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维逻辑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第159页。

指向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群体在文化研究中的“承认”转向。这一转向标志着他们不再局限于个主体或公共领域的单向度研究,而是将理论视野投向主体间领域。泰勒作为文化共同体理论的集大成者,将共同体意识从具体文化实践中抽象出来,形成了基于主体间共识的思维范式,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变革社会秩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首先,承认文化作为“情感结构”的底层意识。

威廉斯主张用“情感结构”形成主体间的承认场域,以达成变革社会秩序的目标。“情感结构”概念指代一个时期或一个社群中“一种在活动中、在冲动和约束中、在认同和反抗中形成的、特殊的生命质感”。它是共享的、活生生的经验,是未经理论化的、对生活的直接感受和反应。在人与自然的交互过程中,“田耕生活已经成了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因一种特别的存在而被赋予了历史地位:这一存在是活跃的、物质的、无意识的;是与头脑相对的身体;同自然的进程密不可分”。<sup>①</sup>威廉斯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它是社会的、物质的过程,是所有成员共同创造和体验的意义之网。威廉斯强调情感结构对于构建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性,认为其作为一个时期内特有的、活生生的、正在被体验着的文化实践,是文化共同体的共享感受。因而,以威廉斯为主的早期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批判理论的特色就在于其对共同体情感结构与人道主义的关注,并致力于同经济决定论作抗争,形成在新的共同体内变革社会秩序的场域。因而,“威廉斯在借鉴艾略特思想的基础上,也强调了文化的整体性,提出‘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sup>②</sup>这种整体的文化生活方式通过团结形成主体间的互动与联系,他强调“团结必须是一种有机的团结:既要承认他人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又要能够尊重和包容异己力量和现实变化的存在”。<sup>③</sup>由此而言,承认不仅使威廉斯的“情感结构”在共同体内更加稳固,更代表着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群体对社会团结的向往。

其次,承认是反思性情感纽带和共同记忆的文化意识。

吉登斯认同理论主张的是反思性承认,它既是向外寻求,更是向内实施的。向外寻求来自他人和系统,如民族主义是“对于某些符号的共同归属感,这些符号可以使特定人群的成员认同他们归属于相同的共同体”。<sup>④</sup>这种共同体的形成,既依托于血缘纽带,也植根于特定人群的共同记忆。向外寻求的反思性承认通过共同的文化、符号形成聚合力,促进共同体的繁荣。向内实施基于对自我的承认,吉登斯强调“个人信仰体系之创建过程,个体借此得以承认‘他首先要忠于自我’”。<sup>⑤</sup>这表明吉登斯的认同理论是基于主体间性领域展开的,即个体要“适当考虑如何在符合交往技巧的前提下承认他人的需要”。<sup>⑥</sup>因而,与霍耐特那种源自德国古典哲学的承认理论不同,吉登斯的反思性承认逐步开始具有部分现代性特征。吉登斯的认同理论倡导对自我、他人、外部系统三位一体的承认,是一种更加完备的承认理论。这种承认理论更具有韧性,深化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共同体意识。

此外,迪克·赫伯迪格“试图在父辈文化和主导意识形态之间开创出一个有意义的中介空间:一个能够发现,并能够表达某种另类身份的认同空间”。<sup>⑦</sup>保罗·威利斯则提出“文化形式为主体性的建构和认同的形成提供了素材和直接情境”。<sup>⑧</sup>他们指出工人们拒绝承认资本家及其国家机器所设定的评价标准,呼吁要在集体行动中构建“相互承认的共同体”。这种反叛性承认形成了一种“斗争性共识”,最

①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365页。

②李隽:《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想转向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第80页。

③许继红:《雷蒙德·威廉斯的现代主义批判探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5年第6期。

④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第118页。

⑤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75页。

⑥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50页。

⑦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陆道夫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10页。

⑧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子承父业》,秘舒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第223页。

终在文化上实现了工人们对自身被支配命运的自我确认与自愿再分配。因而,罢工和抗争的根本在于“为承认而斗争”。通过文化共同体的方式,工人们为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不断斗争,其最终目标是获得一种基于爱、权利与团结的承认。

最后,承认是文化主体达至本真性文化生活的共同体意识。

泰勒通过考察情感认同、自我认同、身份认同等重要维度,认识到了现代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并主张通过批判原子化的个人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同一性,形成本真性的文化共同体,实现社会秩序的变革。

其一,泰勒批判原子化的个人,主张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泰勒指出,这种原子化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定产物,它在肯定个体独立性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的分裂与共同体的瓦解。他认为“道德责任、认同的形成、伦理的努力等都受制于使主体性和能动性成为可能的先验条件”。<sup>①</sup>他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揭示了个体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被异化为孤立的经济单元,从而丧失了其真实的社会性本质。他强调,“异化发生在我所属社会的公共经验不再对我有任何意义的时候”。<sup>②</sup>马克思所追求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真正的自由必须通过重建个体与共同体的有机联系来实现。因而,他提出了超越一元决定论、形成民主决策、承认“我们”的共同体认同的方案。

其二,泰勒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同一性,呼吁原子化个体形成基于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认同。现代人的一个核心道德理想是“成为我自己”,即忠实于自己的内在本质。我们的身份(“我是谁”)是在与“有意义的他者”的对话和承认中形成的。基于此,他批判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文化对个体自我实现的限制,强调生命活动如哺育、生殖等不仅是生物本能,更是文化同一性的延续。个体的同一性是多维度的,涉及思考、感受、决策和社交互动,这些内容通过语言和文化得以表达。语言和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共同体属性,个体通过参与共同体生活获得文化认同和同一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肆无忌惮地迫使人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sup>③</sup>基于此,泰勒指出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仅要求实现个体的普遍尊严,还要求对独特文化共同体身份的承认。总体而言,泰勒的认同理论由人的异化考察到文化的异质,其理论范围更深更广。

其三,泰勒倡导个体在主体间领域实现本真性共同体文化,推动个体通过文化共同体达至自我实现。“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新历史主义哲学思维和学术倾向中,基于本真思维的文化意识是其思想的精华。”<sup>④</sup>本真性是一种道德理想,<sup>⑤</sup>泰勒旨在用这种道德理想推进文化共同体生成。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泰勒批判启蒙运动的自然主义“要求把传统的外部标准强加在自我上,以窒息其本真性的成长和实现”。<sup>⑥</sup>现代的“自我”观念并非天生的,而是由一整套关于道德、自然和神的文化实践与话语(即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构成的。“泰勒基于‘同一性’构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其最主要的特征是使个体回归共同体并参与公共生活。”<sup>⑦</sup>这种共同体一方面根植于本真性的自我实现,另一方面排斥以单一经济维度进行整合。“从更深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大自然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我们的自我实现而得以充分展现,作为理性且自由的存在。”<sup>⑧</sup>他进一步指出,“利益共同体并不在具体

①张容南:《一种解释学的现代性话语:查尔斯·泰勒论现代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81页。

②查尔斯·泰勒:《黑格尔与现代社会》,徐文瑞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第13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83页。

④乔瑞金:《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维逻辑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第41页。

⑤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程炼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31页。

⑥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第739页。

⑦乔瑞金、尤澜:《查尔斯·泰勒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逻辑理路释读》,《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7期。

⑧C Taylor, *Cosmic Connections: Poetry in the Age of Disenchant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p.13.

人类实现的层次上——这种层次处在我和我为之牺牲我当前幸福的未来共同体之间——而是在我们生活的意义层次上加以重建”。<sup>①</sup>泰勒通过梳理现代身份认同的整个文化谱系,肯定了自我实现对文化共同体建构的积极意义,批评了单一经济维度对文化多样性的破坏。他强调,诚实地面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个体走向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构建以尊重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道德地图更“是关于我们道德自我实现的核心”。<sup>②</sup>

泰勒试图通过对文化共同体的理论反思,寻找一种既能维护个人自由,又能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共同体价值的路径。这种努力不仅继承与发展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想,更对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展现出深刻的现实关怀。

#### 四、结语

泰勒认为,“我们归属于一个由共同生活和共同自由所形成的、不断发展且彼此凝聚的共同体”,<sup>③</sup>因而它应当具有“共同体文化与合作意识”<sup>④</sup>的特征。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以责任为基础的共同体核心意识,以共享为目标的共同体目标意识,以承认为导向的共同体主导意识,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共同体思想的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主张在个人领域以责任抵御文化异化,形成以责任为核心意识的工人阶级文化共同体;在公共领域提倡以共享形成文化生活方式,铸造以共享为目标意识的工人阶级文化共同体;在主体间领域推崇以承认变革社会秩序,汇聚以承认为主导意识的工人阶级文化共同体。其积极意义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承继了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核心意涵,即这种共同体不仅能够克服阶级对立和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还能为人的自由联合提供聚合力。他们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入手,指出资本主义逻辑瓦解了原初共同体中重要的责任要素,强调要在伦理和文化层面重建一种以“责任”为内在尺度的共同体意识。泰勒作为侧重研究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意识的学者,批判资本主义逻辑下的“不负责任的监护权力”,主张以“道德地形学”为路径深入挖掘共同体内重要的美德要素。霍加特批评资本主义个体原子化破坏了共同体原有的血缘纽带,提倡用“有机文化”形成文化共同体。汤普森则认为“家长制”带有一定规范性,而资本主义的异化使其衍生出极权等负面作用。因此,他倡导通过构建“可感知的共同体”来重塑其内部的责任要素。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责任要素的主张,不仅体现了其对资本主义分裂趋势的预判,更在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的准确把握。在此基础上,个体与个体之间基本的权利与义务才能被分清,从而为劳动分工、公平分配、合作共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延续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内核,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在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冲突。共享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之一。共产主义社会主张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将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共同所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层面拓展了马克思的“共享”概念,将其从单纯的经济所有制问题转化为一个在公共领域建构反资本主义的、由人民群众领导的共同文化生存方式的整体构想。其中,霍尔通过“编码/解码”“接合”以及符号学等理论指出,共享

<sup>①</sup>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第504页。

<sup>②</sup> C Taylor, *Cosmic Connections: Poetry in the Age of Disenchant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p.139.

<sup>③</sup> 查尔斯·泰勒、姚远:《黑格尔留给现代自由主义的暧昧遗产——1988年3月在叶史瓦大学卡多佐法学院“黑格尔与法律理论研讨会”上的基调演讲》,《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第10期。

<sup>④</sup> 乔瑞金:《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维逻辑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第445页。

文化始终处于对意识形态的争夺之中,并在此过程中被不断被构建。霍尔理论的重要启示在于,受众可以通过“对抗式解码”从被动的文化消费者转变为积极的意义建构者,从而夺回文化领导权。霍布斯鲍姆则主张从历史角度阐明,民族国家所依赖的“共享”认同与文化纽带,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发明”和建构出来的。这种发明可被用以应对传统血缘社会纽带断裂后的认同危机,从而为阶级意识的形成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伊格尔顿揭露了资产阶级文化共享的虚假性,指出应当基于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利益重塑工人阶级主体性,实现共同体的“团结”状态。泰勒作为文化共同体的集大成者,指出共享实质上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本质联系,主张通过大众文化与公共领域对话实现共同体价值的“共同创造”,弥合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分裂,形成无产阶级的文化共同体意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推崇共享的独特贡献在于,它既将作为经济基础规范的“共享”拓展至文化政治领域,又在实践上为日常生活与公共领域的建构提供了对话平台,从而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奠定了理论与现实基础。

第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拓展了人的解放的路径,坚持在主体间领域塑造文化共同体意识,形成互相承认的新社会秩序。他们坚持将“坚实的物质力量和高尚理性的精神力量聚合在一起,形成合力,从而推进社会秩序的转变,形成新的社会秩序”,<sup>①</sup>进而将承认视为变革社会秩序的核心,以文化为介质形塑承认的边界。威廉斯将“情感结构”当作承认的经验基础,揭示出共同体成员要共创一种共享的、未经理论化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为承认提供主体间互动的场域。吉登斯强调用“反思性承认”应对自我、他人以及外部系统的反思性认同,在主体间领域共同构建新秩序。迪克·赫伯迪格和保罗·威利斯提出在主体间领域开拓认同空间,认为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道德伤害,并主张用爱、权利和团结对抗虐待、排斥和侮辱,揭示了寻求主体间的广泛承认是工人阶级心理支撑的核心来源。泰勒吸收了前人的经验,主张通过批判原子化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同一性,形成“本真性”的承认。他倡导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共同体中,同时实现个体的自我实现与共同体的团结。这一思路进一步拓展了人的解放路径,将“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从政治经济革命领域扩展为一场主体间性的文化秩序变革。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工人阶级文化共同体意识坚持以“现实的人”为理论基点,倡导基于责任、共享和承认三位一体的共同体意识生成,在文化领域为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目标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责任编辑:胡春燕)

<sup>①</sup>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等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报告(2021)》,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第162页。